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

宋艳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和深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两种内涵,在《春秋繁露》中,“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所以“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内涵皆有学者加以秉承和延续。随着历史的演进,“大一统”的“统绪”之意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占据了主流。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统绪;大统一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4)03-0049-08

“大一统”是由《公羊传》首先提出,此后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彰显其旨,并被汉代及后世的学者普遍接受与应用。“大一统”究为何意,历来有不同说法。要弄清其内涵,尚需条分缕析。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对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皆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入剖析其“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统”的内涵和意义

《公羊传》在隐公元年开章明义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①《公羊传》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大一统”,认为“王正月”即为“大一统”。《公羊传》并未对此做更多解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对“王正月”阐释道:“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②董仲舒认为,必须是受命于天的人才能成为王者。新王即位,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正朔即正月和朔日。王者即位,必须改变旧王朝的正朔,采用自己的正朔,以确立新王朝的开端。服色,郑玄认为是“车马也”。^③所以易服色就是对车名及马

基金项目:本文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汉代画像与观念世界”(G36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艳萍,女,山东泗水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

^①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2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2页。

^③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四《大傅》,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06页。

色进行改变。《礼记·明堂位》中对各个朝代的车名及马色进行了描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①；“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②可知各王朝的服色皆不同。董仲舒认为，新受命之王，皆要改变旧王朝的服色，实行新的服色。同时还要制礼作乐，实行不同于旧王朝的礼乐制度。王者之所以做这些，是要表明天下已易姓，而非继承于前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宣告自己是受天命的新王。所以，对于一个新王朝而言，改正朔，确定统绪是非常重要的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对改正的意义进一步阐述道：“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③董仲舒强调了改正的重要性，认为三代皆改正，建立了自己的统绪。董仲舒所说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代。三代所建统绪，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三统”。董仲舒的“三统”与“三正”密切相关。“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措，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④所谓的“三正”，就是选择哪个月为正月。董仲舒认为，人类历史按照黑、白、赤三统循环发展，先从黑统开始，然后是白统，然后是赤统，随后又是黑统，开始新的循环。夏为黑统，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斗建寅；商为白统，以十二月为岁首，即斗建丑；周为赤统，以十一月为岁首，即斗建子。继周者又为黑统，以正月为岁首。所以“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在董仲舒眼中，“三正”即“三统”。确立了正月，就确定了统绪，这就是所谓的“统正”。后世所说的“正统”，其实就是“统正”。确立“统”的目的，是要确立新王朝的合法性。

何休对“大一统”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⑤何休认为，王者接受天命，进行改制，布政施教，所布之政，所施之教，要依据自己所建之统来决定。新受命之王将政令与教化推行于天下，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虫，所有人、物皆囊括在内，全要接受新王所改正朔、服色以及政教。而王者布政的时间为正月，为王者的政教之始，标志着新王朝的开端。何休将“统”释为“始”，为新王朝伊始之意，所以确立正月非常重要，是统一天下的标识。确立了正月，就是确立了正统。

《说文解字》对“统”解释曰：“统，纪也。”^⑥“纪”本义指丝缕的头绪，引申指事物的开端。所以“统”亦有开端之意。《释名》中曰：“统，绪也，主绪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⑦《释名》将“统”释为“绪”，何

①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一《明堂位》，第848页。

②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一《明堂位》，第849页。

③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91—192页。

④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93页。

⑤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12页。

⑥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2页。

⑦ 刘熙撰：《释名》卷六《释典艺》，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3页。

为“绪”？《说文》释曰“绪，丝耑也”^①。即丝织物的头，所以绪为开端之意，则“统”亦为开端之意。看来《说文解字》与《释名》皆将“统”解释为开端，这与何休将“统”释为“始”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许慎，《释名》的作者是东汉末期的刘熙，他们与何休属于同时代人，观点相同是可以理解的。何休对“大一统”的解释，源自董仲舒的“通三统”思想。何休眼中的“大一统”的“统”，亦为董仲舒“通三统”的“统”，即《释名》所言“统绪”。

从先秦时期开始，对正月就已经非常重视。《周礼·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②正月是君主布政之时，要将法令悬之于象魏。象魏为国都之阙，国家所出法令一般会在此公布，称为“法象所出”。《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是对先秦重正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他们将正月视为新王朝的开端，为“大一统”，此为《周礼》所未发。

董仲舒非常重视“一”，认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③董仲舒所说的“圣人”其实为孔子。董仲舒认为《春秋》贵“元”，“元”其实就是一。“谓一元者，大始也。”^④将一与“元”相等同，认为两者皆为重视开端之意。董仲舒认为，《春秋》重“始”，元就是始；而王，为人治之始。王正，就会出现各种祥瑞；王不正，就会出现灾异，所以“正”是非常重要的。“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⑤董仲舒所说的“五者”，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其实是何休所谓的“五始”。何休在《文溢例》中明确提到：“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⑥何休认为，《春秋》重“五始”，其实这一思想在董仲舒时已被阐明。公羊家们所说的“五始”，构成了“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汉宣帝时，蜀人王褒在上书中提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⑦一针见血地指出《春秋》的“五始”，就是要立正统。

二、“大一统”与汉为黑统

《公羊传》在隐公元年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公羊传》认为，《春秋》中所言之王为周文王，正月为周文王之正月。周文王在建立政权之后，改正朔，采用建丑之月为正月，即夏历十一月。整个《春秋》中的历法，皆为周历。这种历法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公羊传》有了改制的萌芽。宣公十六年《公羊传》提出了“新周”^⑧概念。“新周”，

①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272页。

② 孙怡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四《官天·大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7页。

③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三《重政》，第144页。

④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三《玉英》，第65页。

⑤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三《玉英》，第68页。

⑥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5—6页。

⑦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3页。

⑧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公第十六》，第687页。

董仲舒发展成为“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董仲舒的“通三统”思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①所谓的“通三统”,即新王即位,要保留上两个王朝的王者之后,让他们实行自己的服色礼乐,新王与上两个王朝之后合称三王。董仲舒认为,“《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②既然继周者为《春秋》,那么《春秋》即为黑统,尚黑。《春秋》为新王,那么周代即为新亡之朝,周代与商代的王者之后,与《春秋》合称三王。宋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成为商朝王者之后的代表,所以有“故宋”之说。“以《春秋》当新王”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这是他“三统”说的重要内容。董仲舒强调“《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③而黑统的特征为:“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妊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④看来,黑统所实行之制,主要包括正朔、服色、礼治、法治、月令等。黑统斗建寅,也就是以正月为岁首,这是夏朝的岁首;服色、祭祀、乐器皆尚黑;礼治亦与黑统相配。尽管董仲舒极力主张“以《春秋》当新王”,但《春秋》毕竟是一本书,无法担当一个朝廷的重任,所以董仲舒采取折中态度,认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⑤“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其实就是所谓的正统。董仲舒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中的“微言大义”,代表着孔子的思想。所以孔子是“以《春秋》当新王”的核心人物。董仲舒认为,《春秋》中有孔子的改制思想,而孔子是受天之命而改制,“西狩获麟”即为孔子的受命之符。这是“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为上天赐予的。孔子以《春秋》为依托,以“微言大义”的形式,明确其改制之义。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是“立新王之道”^⑥,其最重要的目的,即“以待后圣”^⑦,而所谓的“后圣”,董仲舒虽未明言,但其所指就是汉王朝。既然孔子的《春秋》是为汉而作,则汉就应效法《春秋》,建立黑统之制。所实行的制度,应为孔子所作《春秋》中所改之制。首先就是要改正朔,以正月为岁首,并依此改定历法,天下之人与物皆要遵循黑统之制。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大一统”。这里的“统”,即统绪之意。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公然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⑧“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即为儒学。董仲舒此言,概言之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十足的理论依据。在董仲舒的观

①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94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84—186页。

③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95页。

④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88—189页。

⑤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六《俞序》,第155—156页。

⑥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玉杯》,第27页。

⑦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六《俞序》,第156页。

⑧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念中,孔子为儒家的创始人,既然汉代要取法孔子所创之制,就应以儒家为尊,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

何休将公羊学思想归纳为“三科九旨”,在《文溢例》中曰:“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①“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就是董仲舒的“通三统”思想。何休将之归纳为三科九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士人对孔子作《春秋》普遍持支持态度,西汉末期兴起的讖纬神学,更是演绎出孔子端门受命以作《春秋》之说,并直接提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改制立法。如《春秋演孔图》中曰:“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将受命制。”^②“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③讖纬多次强调了孔子为汉制法,并提出“书记散,孔不绝”,意思为诸子百家散佚,而独孔子所创儒学不绝于世。讖纬神学对东汉政治、思想皆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戴宏在《解疑论》中曰:“圣人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觉后生也。西狩获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为周亡之异、汉兴之瑞。故孔子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又闻端门之命有制作之状,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修为《春秋》。”^④这里的“赤帝”指汉王朝,而麟为“周亡之异、汉兴之瑞”,此说显然吸收了讖纬神学之说。唐代徐彦延续这一说法,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此言之,则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道绝,又见麟获,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⑤。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成为西汉中期之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共识,而此说之发端,即为董仲舒的“《春秋》当新王”思想。

三、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改制之间的妥协与调整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在《天人三策》中正式提到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董仲舒是针对汉初以来思想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混乱有感而发。

刘邦在起事之前,醉酒斩白蛇,被人比拟为“赤帝子”。若按照董仲舒的“三统说”,“赤帝子”应该为黑帝。刘邦确实以黑帝自居,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⑦

①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5页。

②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卷二十三《春秋纬·春秋演孔图》,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2页。

③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卷二十三《春秋纬·春秋演孔图》,第373页。

④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3页。

⑤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3页。

⑥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⑦ 《史记》卷二十六《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7页。

秦时只建了四帝祠,却未建黑帝祠,刘邦以为这是在等候自己,于是在雍建黑帝祠,与秦的四时正好凑齐了五帝时。刘邦自比为“黑帝”,以及“赤帝子”之说,皆与董仲舒的“三统说”不谋而合。上文已述,董仲舒认为继周者为黑统。他心目中的黑统,并非秦,而为汉。

战国中晚期,“五德终始说”兴起,认为人类历史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循环发展。秦始皇按照“五德终始说”,采用了水德之制。水德,尚黑,正巧与黑统相契合,所以刘邦接受了秦的德运,汉承秦制,继续实行水德之治。到汉文帝时,围绕汉为何德运问题士人中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是汉为水德说,代表人物是丞相张苍。张苍认为汉为水德之运,它的受命之符是“河决金堤”,而且汉历的正月是冬十月,这与水德之制相符,所以汉应为水德。另一种观点是汉为土德说,代表人物是公孙臣和贾谊。公孙臣认为,秦为水德,按照五德终始说,汉应为土德,土德之符为黄龙出现。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在成纪出现了黄龙,有了土德的符应。汉文帝于是接受了土德之说,拜公孙臣为博士,负责与儒生们一起草定改历服色等事项,为实行土德之制作准备。贾谊也持汉为土德之说,他认为汉兴已二十多年,应当建立起自己的德运制度,于是他“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①,为汉文帝建立土德之制作好了理论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改制之举始终没有实行。到汉武帝时,各领域的混乱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相杂,水德与土德之说相抵牾,到底遵循哪种德运,是政治思想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在历法方面,自汉兴以来,一直实行秦朝历法,以十月为岁首,造成了历法时令的严重混乱。确立岁首,也就是正朔,修正历法,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思想文化领域,从汉初以来,黄老之学盛行,其他各家亦不绝如缕,造成了思想界的混乱。此时的局面,确实如董仲舒所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所以董仲舒强烈请求汉武帝改制立法,统一思想,实行“大一统”之制。不仅是董仲舒,其他臣子也纷纷请求汉武帝改制。司马迁上书道:“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②司马迁表面上针对的是历法问题,其实与公羊学家一样,是要改正朔,实行汉王朝自己的统绪。御史大夫兒宽在封禅后为汉武帝祝寿时说:“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闾门,以候景至。”^③兒宽所说的“三代改制”,与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质文”一致;其所说“建大元本瑞”,与董仲舒“元者为万物之本”思想相同。看来武帝朝的群臣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改制、正本的心愿。

汉武帝时,汉为土德的政治史观已基本定型,封禅改制已成为朝野内外的共同心愿。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顺应众意,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封禅仪式,封泰山,禅梁父,并根据“五德终始说”进行了改制:“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④色上黄,数用五,皆是土德之治的重要内容,但以正月为岁首,则是董仲舒“三统说”的内容。董仲舒所说的黑统,即以正月为岁首。所以汉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制,其实是将“五德终始说”与董仲舒的“三统说”相结合。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

①《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22页。

②《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2633页。

③《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2632页。

④《史记》卷二十六《封禅书》,第1683页。

中的“大一统”,其实也突破了《春秋繁露》中“通三统”的思想范畴。“通三统”中的“统”,为统绪之意,但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可以说,汉武帝的太初改制,与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就是互相向对方的一种妥协与调整。

四、“大一统”思想对汉代及后世的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对汉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立五经博士,并设太学,以儒家思想教育士子,儒学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依据。太初改制,是将“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结合在一起而采取的折中主义。汉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通三统”思想,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令其奉周祀。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令其奉汤祀,真正实现了“通三统”。

前文已述,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的“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为了与汉武帝政治相妥协,“大一统”已经有了“大统一”之意。董仲舒“大一统”的这两种倾向,对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皆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宣帝时,秉承武帝余绪,在政治上多所进取。群臣们亦多有建树,在他们的上书中,多次阐发“大一统”思想。如廷尉史路温舒在上书中提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①路温舒研习过《春秋》,深知“《春秋》大义”,他所说的“大一统”,为“正受始(命)之统”,“慎始”,其实就是公羊学的思想,即王者要改正朔,实行自己的统绪。路温舒是针对武帝的“前世之失”,奉劝宣帝在即位之初就要端正统纪,存亡继绝,以顺应天意。谏大夫王吉在上疏中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谄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②王吉认为《春秋》“大一统”,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这就有了大统一之意。观其言,是期望宣帝能用礼义来治民,达到天下统一的目的。宣帝朝的路温舒和王吉,代表了“大一统”的两种主要观点:前者为“统绪”;后者为“大统一”。这两种思想皆源于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

汉代之后,这两种观点依然延续。唐代李善在《文选》注中提到“然一统,谓其统绪也。”^③表达的意思与董仲舒相同,即以“统”为“统绪”。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对“大一统”进一步解释道:“所

①《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第2369页。

②《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3063页。

③《新语校注》卷下《怀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0页。

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①“凡前代既终,后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系于正月而得其所。故曰‘总系之辞’。”^②从徐彦之言我们可以清晰获知,所谓的“大一统”,其实就是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标志着新王朝开始。改正朔的目的,是要区别于旧王朝,实行自己的“统”。李善与徐彦,皆继承了董仲舒的“统绪”思想。而颜师古却与两者不同,他对“《春秋》大一统”注释道:“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③颜师古眼中的“大一统”,为天下统一之意。他是延续了董仲舒“大一统”的第二种观点,即“大统一”。

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经历几次从分裂到统一的轮回,人们在饱受战乱痛苦之后,特别渴望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大一统”的“统绪”观念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被普遍接受并弘扬。明代的刘基,将“大一统”发展为“大同”观念,即是典型的“大统一”思想。清代时,“统绪”之说只停留在几个公羊学家那里,如庄存与、刘逢禄等,其他人观念中的“大一统”,已经成为“大统一”的代名词。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search on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Great Unity"

Song Yanping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idea of "Great Unity" comes from *The Commentary of Gongyang* and is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and deepened in theory. Dong Zhongshu's idea of "Great Unity" has two connotations. In *Luxuriant Dew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Great Unity" means that unity is great and it is one of the *santong* (three kinds of unity), meaning "*tongxu* (unify the thought)". In *Tian Ren San Ce (Three Schemes about Heaven and People)*, "Great Unity" began to mean "grand unification" to cater to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who had the ambition to unify the needs of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ields.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Great Unit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Han dynasty and later generations. With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the meaning of "*tongxu*" gradually faded, and the meaning of "grand unification" became the mainstream.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great unity; tongxu; grand unification

①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12页。

②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第13页。

③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